

編後語

踏入2018年，慶祝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大小紀念活動紛至沓來。在隆重盛大的紀念儀式過後，心繫中國發展前景的有識之士，相信仍然會孜孜不倦反思過去四十年的改革遺產，思考未來的改革路向，本期「二十一世紀評論」的三位作者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周雪光從宏觀歷史角度回顧了中國的改革歷程，指出中國社會不同階層雖然都分享到改革成果，但是改革的社會風險卻由底層人民來承擔；如何在社會多元化與體制一體化的張力中尋求持續改革的動力，是未來的一大挑戰。任劍濤以「兩極跳」來形容四十年的改革旅程：中國經歷了可能被開除地球「球籍」的危機，到如今積極參與全球治理，倡議「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」。雖然中國取得了重大的經濟成就，但如何將改革落地生根將會是下一階段的嚴峻考驗。賀照田從思想史的進路細緻梳理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「撥亂反正」思潮的來龍去脈，特別是黨國領導人重構群眾路線的複雜原因和深遠後果，強調群眾路線被重構後，「群眾」的地位被大幅矮化，大大制約了過去四十年中國在政治、社會、文化方面走出多元化道路的可能性，令人扼腕。

本期刊出的多篇學術論文均與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的整體發展有關。自1980年代以來，海外華人社團的「再華化」現象備受關注，莊玉惜、梁永生、鄭宏泰以香港客籍社團為研究個案，揭示2003年以來同鄉會等社團數量大增，與一連串政治事件密切相關，社團發揮的社會功能也從維繫鄉誼、發展家鄉經濟，逐漸轉變為協助特區政府施政。改革以來，中國社會的確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轉變，但是在某些環節上仍深受「舊制度」的影響，改革之路步履維艱，農村土地經營權改革就是一個例子。據劉旭東、何東的分析，新一輪牽涉「三權分置」安排的土地改革方案，法理基礎薄弱，違背基本物權法理；他們認為政策制訂者必須突破土地公有或集體所有的慣性思維，切實尋求一種兼具法理基礎、社會保障的改革路徑。

中國社會普遍對物權法理認識不足，或可與當代中國法學中權利理論的曲折成長過程作平行閱讀。黃濤詳細考察了中國權利理論興起及其背後的歷史社會脈絡，勾勒了1980年代以來中國法學從階級鬥爭到權利本位的範式轉變；文章精闢地指出，重視個體主體性的權利觀推動了市場經濟發展，但同時也衍生了種種社會道德倫理問題。1980年代普遍被稱為「新啟蒙」時期，反映在文學創作方面自然是先鋒文學的纍纍碩果。時過境遷，先鋒文學是否已成明日黃花？陳建華對吳亮的長篇小說《朝霞》的敘事和寫作策略作了深度的解讀，指出其對先鋒文學的重新定位，似有緬懷啟蒙時代的意涵。